

年薪数十万美元 却靠捡垃圾过活

他们并非清洁工人，也不是专业垃圾回收者。他们中有的人年薪达数十万美元，但他们的衣食住行用品大都是从垃圾中找回来的，因而自称“免费族(freegan)”。他们的足迹已遍及全世界发达国家，他们并非因为缺钱而放弃原本优裕的生活，而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消费方式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带来了许多的不公正，给环境带来了太大的破坏。纽约免费族的队伍一年来在明显壮大。

校园疯狂“寻宝”

据《纽约时报》6月21日报道，今年5月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也就是纽约大学2007届学生毕业的次日，有15个男女赶到了该校的第三大道北宿舍。这是学年末的大搬迁时期，学生们丢弃的东西都被打包放置在一些绿色的大垃圾箱里，而这些人就是希望能趁机在垃圾箱里大捞一把。纽约大学的学生总体上较为富有，因此他们的垃圾箱里宝贝也非常之多。

20来岁的本·伊伯肖夫现在已经头顶着两顶保龄球帽，身手敏捷的他又将身子深深地探进垃圾箱，结果淘出了一台夏普牌电视机。29岁的奥特



达茜·伊利亚淘到了一对天使的翅膀。

恩·布鲁斯特发现了一幅描绘地中海一处海港的油画，她看了一眼，然后将画交给了另一名同伴。

17岁的达茜·伊利亚现在还是一名高中生，她头上的头发剃去了一半。对于那中等大小的一堆她称之为“家用的零碎玩意儿”的东西——一盏台灯、一个碟架和一些掸子，她显然很高兴，她将它们一溜儿摆在人行道上，引得路人不时投上怪异的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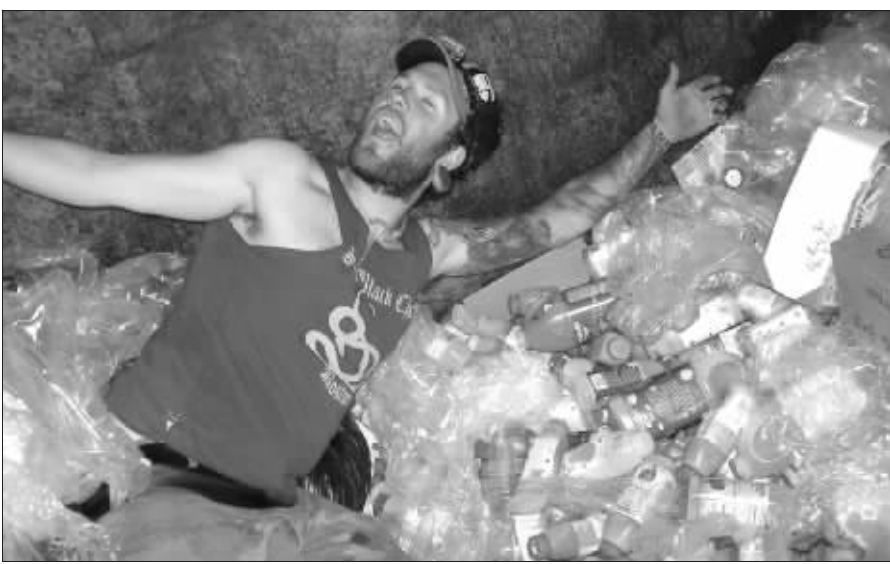
欣赏这些小小战利品的不只是伊利亚。44岁的卡利希齐膝站在垃圾箱里，细细察看着一个塑料化妆品盒。她说：“淘宝当中会有一些小小的刺激，比如说当你看看一张课桌里有什么，结果发现了一本邮册。”

衣食住行都靠垃圾

当天在场的人当中有几个是偶然赶到的，但大多数人都是看了在免费族信息网(freegan.info.com)的一个帖子后，响应号召前来的。该网站提供活动信息和免费出清物品清单，服务对象就是免费族，这一群体的人数现在仍然较小，但其队伍在不断壮大。免费族这个词源于vegans(严格素食者)，许多免费族成员也和严格素食者们一样，排斥所有动物类产品。该网站相当于免费主义运动的一个正式“喉舌”。

免费族可以说是发达国家的清道夫，他们凭消费者抛弃的东西过活，目的是为了将他们对公司化社会的支持和对地球的影响降低至最小，同时与他们所谓的失控的消费主义保持距离。他们在超市垃圾中翻寻，挑出那些通常会被抛弃的轻度受损的产品或者刚过保质期的罐装食品，同时说服那些有同情心的商场和宾馆，请他们捐出多余的食物。

他们穿的是别人抛弃的衣服，用在大街上捡到的东西来装饰自己的房子；这些东西也可能来自免费回收网(freecycle.org)，用户们会在那里挂上自己不想要的东



一名免费族为垃圾箱里的大发现手舞足蹈

西；或者来自所谓的免费聚会，也就是免费跳蚤市场。免费族当中的一些人声称自己奉行着严格的环保标准。29岁的亚当·韦斯曼在4年前创建了免费族信息网，是免费主义运动实际上的代言人。他说：“如果人们选择过一种道德的生活，那做严格素食者还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远离资本主义。”

不满足于主流环保主义

免费主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它起源于反全球化及环保运动，以及像“要食品不要炸弹”之类的组织；后者是一个由一系列小型组织组成的网络，它为那些饥饿的人免费提供从食品市场垃圾中创出来的素食类食品。从免费族身上也可以看出像“创食者”之类组织的影子；“创食者”是旧金山上世纪60年代一个无政府主义街头剧团，它免费提供食品和社会服务。

据纽约圣劳伦斯大学社会学教授鲍博·托雷斯介绍，从去年以来，由于对主流环保主义越来越感到失望，免费主义运动知名度和受欢迎度激增。托雷斯说，环保主义“正蜕变为这样一个问题——认为只要选择消费绿色商品，你

就是一个环保者了”，而不去理会生产和配送这些商品需要消耗多少自然资源。

免费族足迹遍世界

免费族目前已遍及全世界，远至瑞典、巴西、韩国、爱沙尼亚和英国，近至美国本土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不过作为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富裕国家金融中心的纽约，已经崛起成为免费族活动的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韦斯曼对于这项事业的狂热推动，并为其奉献了相当多的自由时间。

该活动在纽约的成功也与纽约垃圾的数量和质量有关。据美国环保署介绍，2005年全美个人、工商企业和各类机构制造的城市固体废物多达2.45亿吨。这意味着每人每天产生约2公斤垃圾。而据纽约市卫生局介绍，这一数字为2.75公斤。

奉行者中有老有少

可以想见的是，免费族当中有许多是年轻人，在政治立场上属于激进左派。和父亲居住在曼哈顿的17岁的伊利亚就是如此，她说自己成为免费族，既是因为环保，也因为“我没有患上资本主义的坏毛病”。

他们当中也有像卡利希这样的中年人。他们有工作，从一些方面来说过的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卡利希是一名高中西班牙语教师，有一辆小汽车，在纽约皇后区有一栋住宅，并将其中的一半出租。她和许多免费族一样，她看来对于自己的行为在环境上的后果有清醒的认识。比如说，她家中的木地板已经日渐老化，但她并没有去更换新的，而是使用由许多碎片拼成的地毯。

绝对免费主义不可行

当然，生活在当今的美国，要不购买任何新的制成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要回避任何需要利用资源来生产、配送或者运转的东西也是如此。比如说，免费族能不用液化气或者电来做饭，或者不用商业产品来刷牙吗？

“我时不时也会购买一盒小苏打作为牙膏，”韦斯曼说，仔细分析一下就可发现一盒小苏打会比牙膏更环保，因为它所使用的包装纸盒是可降解的。

这些理想与实践上的冲突已经导致一些人暗示说，免费族尽管在呵斥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是，但又依靠它来生活，因而他们是虚伪的。甚至

连常常严格推动免费主义运动的韦斯曼在被逼问下也承认，绝对的免费主义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严肃承诺必不可少

这并不意味着信奉免费主义不必作出认真的承诺。免费族相信任何产品的制造和输送，都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造成多方面的不公正，因此但凡与市场打交道就会让他们心烦意乱。这一点对于一些免费族尤其成为问题。就拿玛德琳·纳尔逊来说吧，她直到最近还在曼哈顿过着中上层人士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有仆人打点，消费着各种奢侈品。她选择过免费者的生活，就需要做出相当程度的甚至可以说是剧烈的转变。

近日的一天下午，纳尔逊一边在厨房里做中餐，一边说：“我的整个观点，就是不要公司化美国的账，我也憎恨向银行贷款。”这顿食物中有土豆和豆瓣菜汤、饼干和干酪，全都是此前从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各家商场外的垃圾堆中找来的。

她现在渴望有一个弹簧扣平底锅来制作干酪饼，不过她正在等待着“免费回收网”上有人提供。书架上没有任何新书，她已有6个月没买一本书。但她现在常常去上“书籍漂流网”，在那里和别人共享旧书，或者上公立图书馆去借。

但这样做是不是太与自己过不去？“在这一点上我感觉复杂，”她说：“放弃阶级特权总是很困难的。但免费族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你们正在剥夺各种资源。”

并非“只坐在家中吃糖果”

自从成为免费族以来，纳尔逊花费不少时间将各种免费品的清单及其他信息发布在网上，同时为因参加反对使用小汽车而被逮捕的骑车人士提供法律援助。“我并不是只坐在家中吃着小糖果，”她说，“我在工作。我只是不为钱而工作。” 钟山 编译

二战时期鲜为人知的“大逃亡”

由球王贝利主演的二战影片《胜利大逃亡》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可很多人并不知道，二战时期还有一个真实的“大逃亡”的故事，只不过这个故事的结局更加悲惨：1944年3月24日到25日的晚上，76名盟军战俘逃出了位于柏林西南100公里的萨甘的德国第三战俘营，他们选择的出逃道路是个叫“恶魔”的地道。可是不出一天大多数人又被抓了回来，盛怒之下希特勒处死了其中的50名战俘，公然践踏了身为签约国之一的《日内瓦公约》；另外23人被重新拘禁，只有3人侥幸重获自由——一名荷兰人和两个挪威人，都是与英国皇家空军并肩作战的飞行员。他们惊险的逃亡故事，从萨甘火车站开始……

独自逃亡

英国皇家空军上尉布莱姆·范德斯托克在纳粹入侵家园时成功逃出了荷兰，在二战开始的几个月里一直驾驶着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战斗。但不幸的是，他和其他盟军士兵一样，被德军俘虏后关进了战俘营，他被关在第三战俘营。第三战俘营的战俘偷偷成立了逃亡委员会，战俘们挖好了一条地道，布莱姆被列入首批进入地道的20人之一。

布莱姆独自一人钻出地道，小心翼翼地穿行在乡间丛林中，却差点撞在了一个黑影身上！这是一个德国平民，他尖声喝道：“这么晚了你还在这树林里干什么？”布莱姆按照预先演练的内容回答了他：“我是个荷兰工人，我担心警察会因为我在空袭时还出门在外而逮捕我。你会说荷兰话吗？我被吓坏了！”

这个德国人不会说荷兰话，但是布莱姆的伪装完美无瑕，这名德国人决心帮助他，于是把布莱姆带到车站后就离开了。接着，布莱姆认出了一名来自战俘营的德国检查员，他知道她视力不太好，心中默念不要被她认出自己来。实际上，当

时她正对站台上一个人起了疑心，布莱姆也认出了那个人——他叫托马斯，是一名英国飞行员（后来他在捷克斯洛伐克霍多尼恩再次被纳粹抓住，并于当年的3月29日被枪决）。

布莱姆故意靠近了一些——面对怀疑最好的办法就是大胆面对。她的问题直接而尖锐：“你今晚要出门旅行吗？”至少布莱姆对自己的德语还是挺有自信的：“是的，我是个荷兰人，你能从我的口音听出来。”她对此感到满意。

开往布雷斯劳的列车于凌晨三点半到达，布莱姆上了二等车厢。火车于清晨五点抵达布雷斯劳车站，那里没有匆匆忙忙的安全检查，没有成群的盖世太保或秘密警察警觉的眼睛——这说明逃亡地道还未被发现……

安全抵达成斯德丁

彼得·伯格兰德是挪威人，在德国入侵其祖国时逃到了英国，在那里他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不幸被击落后被关进了第三战俘营；他与同样来自挪威且同在英国空军服役的简斯·米勒决定一起开始逃亡，他们决定前往斯德丁，那里有

瑞典船只定期停泊和出航，两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瑞典话。

他们是第43和第44个钻出地道的，米勒后来给情报机关的报告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穿过地道用了大约3分钟，当我爬上地面后又抓着一根拴在树上的绳子爬了几英尺，后来伯格兰德与我汇合，我们步行前往萨甘火车站。我们登上了凌晨2:04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随身文件证明我们是来自法兰克福李贝兹拉格劳工营的挪威电工，前往萨甘附近某处工作，在从法兰克福到斯德丁的路上，我们还有另外一份文件，上面说明我们需要变换工作地点，前往斯德丁。”

剩下的旅程可以说是波澜不惊，他们搭上一班坐满平民的客车，在顺利于早晨6点到达法兰克福后，又于8点搭上了开往库斯特伦的中转车。

接着，他们又搭上了10点钟从库斯特伦开往斯德丁的火车，并于午饭时分到达了目的地。然后在黄昏之后来到了逃亡委员会指定的一个地址。这是家法国妓院，上写——专门接待外国人，德国人禁入。妓院里一个瑞典男人说他的船将于当晚离港，约好晚上8点在妓院外碰

头接他们走。

然而瑞典人失约了，他们只好在次日下午6点钟又赶到了妓院，正碰上另外两个瑞典水手开门出来，当听到这两个挪威人的难处之后，他们决定出手相助：“你们和我们一起坐有轨电车到我们停泊的码头去，那是在帕蒂兹附近。”这时已是晚上8点半，瑞典水手懒散地走到德国哨兵那里，向他们出示证件，两个挪威人紧随其后，哨兵倒是没找什么麻烦，甚至没有要求他们出示证件。

当平安上船后，他们藏身于放置船锚的房间，两个瑞典水手给他们带来了食物和水。最终，他们平安抵达了瑞典，他们去找英国领事馆——作为76名逃亡者中的两人，他们已经自由了。

前往直布罗陀之路

布莱姆坐在布雷斯劳火车站的一条长凳上，假装正在打盹。他坚信一点：单独走的人走得最快。他买了一张前往阿尔克马尔的二等车厢车票，并于上午10点到达德累斯顿，在这里他不得不滞留相当长一段时间。他进了两家电影院，在里面打盹直到晚上8点，然后回到车站搭乘前往荷兰边

境本瑟伊姆的火车。这时他意识到逃亡地道已经被发现，大追捕开始了，因为他的证件被四度仔细盘查，到达边境时又被检查了一遍证件，不过这次相对宽松多了——他的荷兰话自然流畅，证件也很正常。接着他继续坐火车前往奥登扎，然后是乌德勒支，在这里逃亡委员会给了他地下抵抗组织的地址，那里的人们欢迎他的到来，给他一份伪造的身份证和定量供应卡，并让他在家里安全呆了三天。

他骑自行车前往比利时的另一处安全地点，在那里他又得到了一套比利时身份证件，然后再乘火车来到布鲁塞尔和巴黎，不断更换身份证件，并向南来到法国城市图卢兹，与法国地下抵抗组织马基游击队接上头，在那里他还遇到了两名美国陆军中尉、两名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一名法国军官和一个做向导的法国女孩。他们一起翻过了比利牛斯山脉，抵达勒瑞达，最终布莱姆·范德斯托克于7月8日到达了直布罗陀。几天后他回到了英国，成为此次大逃亡行动的第三个真正获得自由的人。

阿木